

李梓新◎编著

如何报道

国内第一本灾难报道手册

中国新闻史上最成功的灾难报道——汶川大地震媒体操作实录

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向国门的灾难报道——南亚海啸媒体操作实录

首次引进美国灾难报道权威德特研究中心 (Dart Center) 的实操指导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灾难

如何报道

李梓新◎编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灾难如何报道 / 李梓新编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652-825-9

I. 灾… II. 李… III. 新闻报道—手册 IV. G2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9642 号

灾难如何报道

编 著: 李梓新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灾难报道推动中国媒体进步

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令全世界震动。率先行动起来的，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长期以来，由于体制、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灾难报道本身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很多题材没有被挖掘。作为个体的新闻从业者所积累的灾难报道经验也没有被规范地整理、总结、传播乃至共同讨论，更无法在广泛意义上做普及。

随着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出现，媒介作为公众力量在其中的角色凸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SARS到禽流感，从2008年初的雪灾到年中的大地震，可以说，灾难报道的概念已经在中国开始成型，其进步直接推动了中国媒体的进步。

汶川大地震，不仅使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进一步觉醒，也使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达到空前的高度。然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奔走在前线的记者必须具备充分的科学知识以及实战经验，才能最大化地体现报道价值，传递灾区呼声，同时也确保新闻从业者自身的安全。

所以，我们总结了2004年底南亚海啸后国内外记者的报道经验，以及这次地震报道中主流媒体的报道经验，再加上美国德特灾难新闻研究中心(Dart Center)数年来所总结的美国新闻业灾难报道的先进经验。作为中国第一本可供借鉴的灾难报道参考书提供给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学生以及其他一切关心此领域的社会人士。也作抛砖引玉之用，期待有更多的关于灾难报道的专业探讨不断出现。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致力于和中国新闻界一起，共同

探讨中国灾难报道的发展。2005年3月，南亚大海啸刚过3个月，一个由各国媒体参与海啸报道的编辑记者所组成的学术研讨会便在汕头举行。那是中国大陆媒体学术界第一次举办的关于灾难报道的大型研讨会。而今年10月，就在汶川大地震过后5个月，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又在汕头举办了灾难性报道高级研讨班。来自中国国内参加此次地震报道的数十家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齐聚汕头，共同探讨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面前，新闻人的使命和担当，并总结经验教训以供后来者参考。

面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人类所知晓的秘密还是显得太少。而新闻工作者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如何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将永远值得探讨。而在中国的新闻环境下，灾难报道的突破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带着勇气的突破也必将推动中国媒体在21世纪的发展和前进。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陈婉莹

2008年12月

前言

灾难报道是新闻人共同面对的命题

一场8级大地震，让“灾难报道”这个词语，在国人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对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日益迫切要求他们交出自己的答卷。

“灾难报道”作为一个新闻术语，在中国一直以来属于非主流的模糊地带。什么是真正的灾难报道？很多媒体从业者未必能说得清。它掺杂了政治、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因素，这反而使它过于沉重而难以轻快地浮现概念。

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国人日益重视生命的可贵，越发意识到灾难面前人命关天。因人道救援和人性关怀而引起的对灾难报道的重视，逐渐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在挑战死亡面前的专业功能及社会作用开始被引起关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央电视台首度24小时滚动直播，各家中外媒体各显神通，第一时间传递灾情和救援情况，使灾难报道终于拨云见日，得到全社会的全面认识。

然而，由于长期的忽视或者掩盖，灾难报道在中国媒体实际操作中，仍然处于陌生的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成熟的应急体系和指导方针，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积累。社会气候虽然形成，但媒体从业人员自身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却经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或感觉茫然失措，一头雾水；或违反灾难报道中的一些科学规律、伦理道德。这就使对灾难新闻报道进行全面总结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灾难报道，从最直接的含义来说，就是报道发生的灾难。灾难一发

生，新闻人的敏感和热情就会立即被调动起来，从而使他们最快地奔向第一现场。到了现场之后，如何迅速而安全地展开报道，是缠绕在灾难报道记者心头的一个问题。

首先，新闻从业者需认识到，灾难报道是一项专业新闻技术，是新闻实务操作里面一个特殊的分支。

灾难报道是一项技术工作，并不是只要有新闻热情就可以完成。它的复杂性在各种报道之中，几乎首屈一指，它要求记者既要有专业的科学知识、灾难常识和救援知识，还要有对人性、人心的洞察和了解，其难度不亚于记者公认的最高追求——战地报道。

灾难报道至少包含以下的要素：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事实、相关人士（受害者、救援者）、科学因素、心理因素。这种种因素带来的对一个记者的综合要求极高。一个优秀的灾难报道记者，必须熟悉政策环境、社会总体环境和当地社会环境，能迅速了解事实真相，具备科学理论基础，拥有健全的身心健康，同时还能有恰当的交流沟通方式。

所以，灾难报道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领域，灾难报道必须是具有科学精神的报道。这方面必须由有识之士和专业人士进行长期的研究和探讨。

西方媒体经过多年的报道积累，已经有一些经验总结。近年来，各种灾难报道的媒体研究所也逐渐兴起，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模板。美国的德特研究中心（Dart Center）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近5年来的研究已经开始形成系统，分门别类，包括自然灾害、人为事故、暴力、心理、儿童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并在不断完善中。本书便引进翻译了他们的一些研究文章。

其次，在解决了技术范畴的问题之后，新闻从业者对灾难报道仍然有重大的认识问题需要厘清。

很多记者，甚至是进行一线报道的记者，有时仍然对在大灾难降临之后的新闻报道的作用心存疑虑。他们在一线现场经受着作为自然人还是作为新闻人的巨大伦理冲击。从自然人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自己应

该去救人，救出一个是一个，而不是试图以旁观者的姿态，用笔和镜头保持记录。很多记者在这种巨大的冲击面前丧失了内心的平静，感到沮丧、无力或者动摇，还有的记者为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们认为，面对巨大的灾难，记者这个社会角色被赋予的功能就是第一时间传递信息，通报灾情，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唤起社会的凝聚力，乃至把声音传达到全球，让全球社会共同为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灾害而行动起来。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然而，记者本身作为人的个体，同样也有七情六欲，同样有生理机体的自然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记者个体在某个阶段的精神状态。然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多地被提及或者加以专门研究。本书也试图提供一些可为新闻从业人员参考的心理指导文章。另外，通过阅读同样身在前线经历灾难伤痛的记者们的心理体验，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启示以及相互的心理支持。

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路也正长。它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至80年代间，大量的灾难报道被处理成政治报道，更多的被处理为社会新闻报道。而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咏叹调”系列报道、1998年的抗洪报道、2003年的非典报道、2008年初的雪灾报道以及年中的汶川地震报道，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灾难报道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它们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操作的，并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帮助国家战胜灾难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灾难报道的发展。一代代新闻人的努力值得谨记。中国灾难报道也正在沿着它独特、曲折，然而不断追求专业化的道路前进。

中国灾难报道的明天是光明的。

李梓新

2008年9月6日于美国芝加哥

目 录

序 灾难报道推动中国媒体进步 / 1

前言 灾难报道是新闻人共同面对的命题 / 1

第一篇 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 1

导言 / 2

杨磊：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 / 4

李虎军：《财经》的选择 / 16

李海鹏、陈江：“史上最牛官腔”的由来 / 29

王恺：我经历了极度愤怒的状态 / 39

方玄昌：人性冲击下没有职业之分 / 47

包军昊：我觉得央视可以打 98 分 / 56

魏海波：如果记者去救人，那是我的骄傲 / 68

吕宁思：凤凰卫视的优势在于差异性 / 77

邱立本：震出中国新闻报道新格局 / 85

Lucy Hornby：我始终觉得有非常大的责任感 / 91

Edward Cody：中国政府出乎意料地开放 / 99

David Gray：我喜欢成为一个安静的观察者 / 105

钱钢：从唐山到汶川今昔谈 / 110

第二篇 美国的灾难报道经验 / 123

导言 / 124

第一章 记者采访报道指南 / 125

第二章 记者的自我保护 / 142

第三篇 南亚海啸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 155

导言 / 156

李虎军：二赴班达亚齐灾区 / 158

朱雨晨：市场化媒体灾难报道的突破与不足 / 162

陈实：《南方都市报》的海啸报道策划 / 166

罗绮萍：国际记者证的重要性 / 171

李鸿谷：谁是海啸的新闻主角 / 174

史哲：选择柔和的东方视角 / 179

唐建光：灾难发生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 / 184

聂晓阳：做有思想的灾难新闻 / 187

闫丘露薇：凤凰卫视的海啸报道运作 / 192

阿布多尔卡里姆：Time Magazine 海啸报道的策划与运作 / 199

小黑纯：日本媒体对地震及海啸的报道 / 202

纳尼·阿弗雷德：受害者厌烦记者了吗？ /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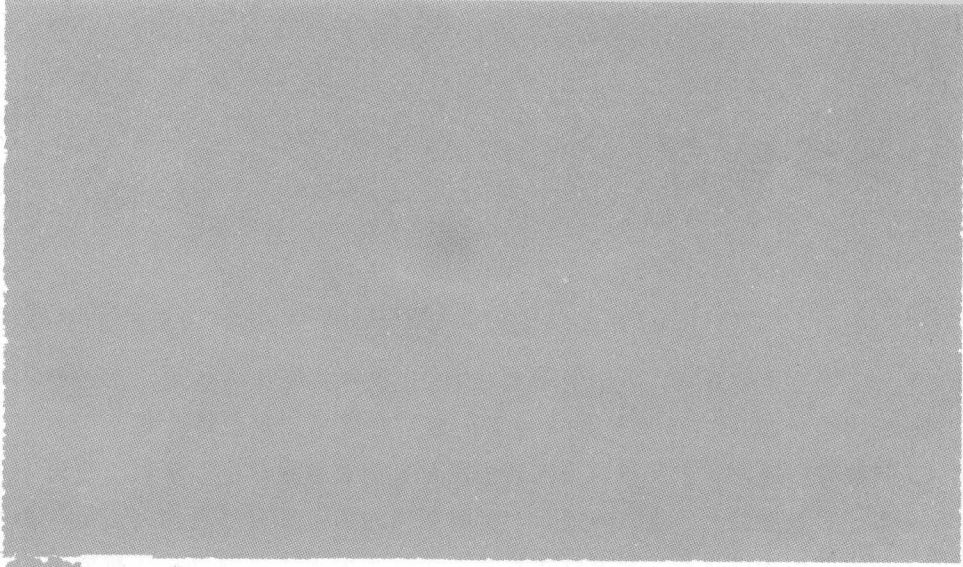
丹迪·拉克松诺：来自印尼震央的报道 / 207

附录：中国灾难报道史略 / 211

钱钢：中国灾难报道——从昨天到今天的理念 / 212

卢跃刚：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中国灾难报道 / 218

后记 / 224



第一篇 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灾难如何报道

>> 导言

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将看到来自 12 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 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我们将看到他们如何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投入到抗震救灾的新闻报道中。新闻不分国界、种族和肤色。在灾难面前，所有新闻人的心都是共通的。这是一场空前的新闻战役，所有媒体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新闻又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操作特点，值得我们总结和分析。

在这个章节里，我们可以看到：

《21 世纪经济报道》北京特稿部主任杨磊是如何出生入死，在第一时间赶到北川中学和北川县城的地震现场，并在四周死寂，黑漆漆只有一点亮光的北川县城住了一夜。他还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他说他人生中第一次在采访中哭了，这是因为和茂县的孤儿一起在直升机上，看到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便是永别。

《财经》杂志高级记者李虎军是如何协调前方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协调快新闻与深度报道之间的关系，协调网络和平面媒体之间的协作。

《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陈江是如何深入到北川，写下《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这篇在 5 月份流传甚广的报道，并讲述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官腔”一事的由来。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恺是如何克服自己的愤怒和不平静，克服自己心理的极端状态，回到记者的本职上，发出现场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科技部主任方玄昌是如何从经历北川县城现场所带来的巨大震动中走出，反思在灾难面前人性和职业的冲突，并作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反思了中国媒体的科学报道。

《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中心主任魏海波是如何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坐镇成都，指挥南都前方数十人的报道队伍。他们甚至成立了航拍组。而在哀悼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一岁的儿子。

凤凰卫视新闻采编总监吕宁思是如何在新的媒体报道形势下应对

挑战，在人力物力财力均不及 CCTV 的情况下，如果作出自己具有差异性的特色报道。

《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是如何从全球华人的角度来看待地震，如何从历史角度来看待地震中催生的中国公民社会，如何面对中国新闻报道新格局的挑战。

路透社女记者 Lucy Hornby 是如何以一个女性以及外国人的视角，深入灾区，记叙她眼中的地震惨状。经历过云南丽江地震的她对灾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在采访时经常止不住流泪。

《华盛顿邮报》北京中心首席记者 Edward Cody 作为一个经历过几十年世界风云，报道过南亚海啸等重大灾难的记者，是如何看待汶川地震的不同特点，并如何从地震中看到中国社会的转变。

路透社摄影记者 David Grey 是如何以一个摄影记者的眼光，看待镜头下的灾难。一个摄影师的挣扎和自我调节尽在其中。

还有一位特殊的受访者，是地震报道的前辈、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媒体计划主任钱钢。他比较 32 年前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之间的异同，体会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讲述媒体灾难报道在 32 年来的进步和不足。

以上这些访谈记录，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访谈的原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场的感受和记忆被最真实地保存，同时为灾难报道的新闻研究提供一些原始的素材，以作抛砖引玉之用。这场中国新闻历史上少有的报道战役，留给人们回味和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杨磊： 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

杨磊：《21 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2001 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云南地方媒体工作，负责政法新闻报道。2002 年底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负责突发及灾难事件报道。

杨=杨磊

李=李梓新

李：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前线？

杨：我是 5 月 14 日早上到，本来打算 12 日去的。地震后我们马上就有记者去国家地震局了。当时找了地震局一个要去灾区的专家，我们说要跟他一起走，但他说要收拾行李。我们约在首都机场见面。3 点半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他收拾行李，结果他已经从南苑机场坐军用飞机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被耽误了一天，改到 13 日的飞机。但是上午的航班都是救灾的，只有等下午的航班。坐下午的航班飞到重庆，再从重庆包车去成都。

李：当时和专家一块儿走是报社行为还是部门行为？

杨：报社当时是想派人去的，但是有关部门下了禁令，就在下午 5 点多的时候，不允许去，报社就犹豫了。但作为特稿部，本身就是应对

突发事件的，我觉得不能不去。成都站的记者也找不着，于是我就带着几个人去了。我们后来打听了《南方都市报》，谁都没有管禁令就去了。那天恰好是周一，我们周一开编前会，领导们都在。

李：编前会的时候就知道地震的消息吗？

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编前会正要开始。这时有一个女编辑说她血压低，头晕，后来大家才发现不是她的问题，是整幢楼都在晃动。10分钟后有人收到短信，说四川省发生了大地震，于是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大概在4点钟，我们就有记者去机场，跟地震局的专家。我们又派了很有经验的记者徐凯从重庆去成都。他包了一辆车，到了成都已经是夜里10点多。他拉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家里受灾的，他就跟那个人到他家写了一篇稿子，当天夜里12点多发回来。

李：你们当时的人员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杨：当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我以为我，加上徐凯、左志坚，3个人就够了，后来总部从广东又派了两个人。因为当时能从广东飞成都。

李：5月14日的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杨：有15个人。加上当地记者站记者。

李：后来怎么又增加到30个人呢？

杨：我们到了现场，发现大家都乱了，也有人是没有报告总部就自己来了。我们有一个同事开始说因为母亲一个人在成都，所以要回家陪她，但是到了当地以后他没有回家，反而去绵阳采访去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真正有规划地增加人是在第二个星期，5月19日左右。那时候现场救援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灾后重建。我们派去了一些常常在北京、上海跑政府如卫生、民政等线的记者，他们资源会更广。

当时去前方的主任有3个，我和其他两个人。我们分属不同的中心、不同的领导，后来派来了两位编委，指挥调度会比较好。成都也是一个天然的编辑部所在地。

李：后来为什么考虑让编辑直接上前线？

杨：我们刚开始比较乱，记者写了稿子不知道该发给谁，也不知道怎样安排，放到哪个板块，怎么处理。于是总部从后方调来了3个编辑，他们直接在前方组成一个编辑部，稿件统一归他们，由他们来协调。

李：你去的时候，怎么分条线的？

杨：我到了成都时，整个成都站的人都归拢了，我给大家开了一个短会。希望女孩子去的地方都是当天能回到成都的，男孩子去一些受灾

严重的地区，比如北川。因为徐凯比较有经验，我就把成都到都江堰的路线给了他，把绵阳留给自己。我是14日下午到绵阳的。

李：到绵阳的路还通吗？

杨：从成都到绵阳的路还可以，一直可以通。但再往里走就困难了。

李：那你们是怎么再深入进去的呢？

杨：我们从绵阳包车到安县。到安县又包了一辆车。但是走到半路，在亚洲风洞，就遇到交通管制了。因为要进去的车太多，堵路了。虽然当时我拿着绵阳市委的采访证，也没有用。后来我就走路上去了。

李：然后你只能步行？步行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

杨：对，走路进去。我为了减轻负荷，相机都没拿。就背了电脑，发稿用的，拿了一瓶水、一个手电筒、一个收音机。

李：收音机能够收到信号吗？

杨：时断时续。

李：走了多久？

杨：走了5个多小时。

李：大约多少公里？

杨：地图上标的是13公里，老乡说实际有15公里。路非常不好走，随时有石头掉下来，阻挡道路。运灾民的车也不照顾走路的人，所以人走在路边比较危险。

李：你看到过逃出来的灾民吗？

杨：灾民都在一大块空地上等候。因为有警察告诉他们不要走，会有车来运送他们出去。

李：有没有寻亲的人和你一起进去？

杨：有8个成都的人来寻亲。成都有一個老年大学组织师生去北川西乡羌寨参观，那天地震的时候正在北川参观，所以他们的孩子要进去寻亲。但是警察没有让他们进去，我是因为有证才被允许进去。我把电话留给他們了。

李：后来在网上写下《北川寻母记》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在里面？

杨：那个人我见过。我给了他一包烟。他装备很专业，我还以为他是同行。

李：你到的第一个比较惨烈的现场是北川中学吗？

杨：是擂鼓镇。我当时看到特别害怕。我不知道羌族人死了以后还要裹得那么严实，放在一个门板上。门板是悬空放着的，用砖头或者板凳架住。空隙里面点着一根红蜡烛。我原来看到亮光以为是活人，还想

上去问路，后来才发现是死人。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比较恐怖的是镇上既有死人又有活人，但是看到活人更害怕。幸存的人都待在那里。天上又飘起小雨。

李：天那么黑了，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使你决定向前走呢？

杨：做新闻的人，基本的感觉是既然来了，还是要到现场去的。当时我看到那些惨状，就想到现场肯定更惨。我从来不能想象一大群人坐在一边，跟傻子一样，行尸走肉似的。手电筒一晃，他们都带着惊恐“唰”地站起来，但又不说话。镇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安慰镇上的人，说我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空车，肯定是来救援他们的。但是他们也不理我。

李：于是你就继续向前走吗？是不是有些部队可以给你壮胆？

杨：我看不见，但是能看到军车往里面走。

李：你有同行的伙伴吗？

杨：有，是《生活》杂志的记者。

李：后来就到了北川中学吗？

杨：是的。

李：到北川中学是几点？

杨：夜里10点半。我觉得特别震惊的是走到收费站的时候遇到几个绵阳的小孩，他们当志愿者。我有手电筒他们没有，我们就一起走了。他们以前在北川中学读过书，但是当我让他们带路的时候，他们在路上转了4圈，都找不到那学校。我觉得如果本地人都找不到原来的地方，那地震肯定特别严重。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亮光，才觉得是北川中学。走进北川中学的门，看到到处都是帐篷，迎面过来是一辆冷藏车，是来运尸体的。当时还是比较乱的，很多帐篷都没有搭好，很多车进不去，我进去时吊车已经在开始吊了。

我进去时车上的死人摆得特别规矩，每一个尸体放上去，都有人给尸体量身高、拍照。刚开始尸体放上去时还有声响，后来慢慢慢慢就没了，因为死人太多了。

李：现场有父母吗？

杨：有很多父母，都在现场哭。一方面他们想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看是不是活着，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后来他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救援战士一旦发现一个活人，都会喊医生。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救援队伍发现的都是死尸，就会直接扔上车。

李：那天晚上你是在北川中学过夜吗？